

武進文史資料
卷三

第三輯



目 录

- 李兆洛事迹片段 邬宗浩 (1)
李兆洛的方志学 陆振嶽 (12)
李兆洛与文学 梅鹤征 (25)
王诤传略 金振之整理 (30)
我在常州“五四”运动时代的一点回忆 沈琴华遗稿 (37)
李兆洛撰书的横山桥对联石刻 (39)
在武南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年代 汤漱 (40)
关于恽代英同志狱中词征集经过 吴之光 (53)
优秀的新闻战士孟秋江 谢金 (55)
李兆洛中举受师训 (61)
抗战烈士路景荣 金鑫 (62)
武进光复之回忆 吴山秀、吕叔元遗稿 (64)
忆朱稚竹先生 纪平 (69)
剧坛奇葩——锡剧 李祺 (74)
锡剧艺人王嘉大 陶红亮 (87)
光复以来武进政制小考 (90)
名艺人高和甫 汗塘乡志办 (91)

天宁刻经处	包家良	(92)
天宁寺恒海和尚传略	萧吾	(94)
1949—1958年县内的几个第一		(99)
武进货币史话	张文仪、朱伟民	(100)
武进县民众教育馆史	徐骏	(106)
北洋军纵火洗劫焦垫始末	徐惠卿	(114)
千家万户送瘟神		
——记武进县消灭血吸虫病	时雨苍	(121)
风水墩、野鸡墩、兴旺墩		(123)
乾隆常州吃“趁热”	吴之光	(124)
东青天主堂		(126)
封面题字：谢稚柳		

李兆洛事迹片段

邹宗浩

李兆洛的家世

李兆洛的先世本姓匡，因避宋太祖赵匡胤讳，改匡为王，世居无锡夹山（今属武进县南宅乡）。明神宗万历年间，有个叫王本成、字慎吾的，从小丧了父亲，跟着母亲搬迁到武进县辋川里，即今三河口乡的麻皮桥，拟到外家就养。里人李春华，无子，见本成聪明老实，把他强留家去，抚育成长，认做自己儿子。本成成家后，感激李春华抚育之恩，又念他年老无依，不忍离去，便决定不回夹山归宗，留居辋川，冒了李姓。本成的孙子李孟智，字明之，始迁居三河口西街。这是三河口李氏的始分祖，也就是李兆洛的高祖。李兆洛的曾祖名文骐，字璞庵。祖名衍曾，字惕斋，国子监生。父名征兰，字敬亭，阳湖县学生，为人沉毅博达，乐善好施，常与城乡文士交往。胞兄康龄，字五初，曾多次参加乡试，没有中式，乡人都称他五初先生；其子毓华，名硕，顺天举人，广东四会知县。从伯攀第，字留庵，文名重乡里；其子宝璐，字景昉，举人，在外服官多年。宝璐，字景昉，县学生，善诗文书画。“科第功名，萃于一门”，家中“有书数万卷，简帙不外取。”是地方上有名的书香世家。到李兆洛中了解元，登了进士，授了翰林院庶吉士，李家的名望就更大了。

李兆洛的读书时代

李兆洛出生在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五岁时，他的父亲特请宜兴名宿路思元到家中，教授兆洛和其他子弟。

路思元原是兆洛父亲的业师，教学非常认真。兆洛读书很聪明，每天能熟读百余行。十三岁时，跟外祖奚蕉峰住在塾中读书，每晚陪外祖一块睡。蕉峰，名宾，岁贡生，博学有名。清晨黄昏，只要是兆洛也醒着、不想再睡的时候，外祖常会给他谈讲各种学问。蕉峰的弟弟奚寅，进士出身，做过衡山知县，有政绩。他的学问和平日言论，也给了兆洛很大影响。

李兆洛十五岁时，从铜陵县学训导胡尚孩举人受业。除学习日课外，还在一年之中读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两部历史巨著。书中重要地方，都能熟读牢记。后来他常对人家说：“《通鉴》以知人，《通考》以博物。”这是他读了这两部书的重要心得。

十六岁，从含山县学训导高梦簪举人受业。这一年，李兆洛首次到阳湖县参加县试。知事陈某看他年纪最小，交卷最早，不免奇怪起来，就找兆洛当面询问，兆洛应答如流。陈知县把兆洛的试卷全文仔细看了一遍，又详细查问了家世，于是郑重地对兆洛说：“你可以准备回去，我不再找你复试了。全场考生虽然还没有全部交卷，但是可以讲一句，不会有什么人能够赶得上你；如果让你复试，定是全场第一。你童年初试，盖过全场童生，这不是我对你的真正期望。你快回家继续攻读，切不可误了前程。”陈知县讲完了这番话，就当堂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李兆洛。那对句是：“他日定成名进士，乃翁真有好儿郎。”一时传为佳话。

李兆洛回家后，在父兄及其他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潜心钻研学术。十八岁起，从廪贡生吕云庄读了三年。接着又到常州龙城书院肄业。当时龙城书院的主讲，是浙江余姚翰林学士卢文弨，学者都称他抱经先生。李兆洛在书院内，认真攻读文史诸书，独不屑学习训诂，亦不孜孜于科第制艺，卢学士对他

很为器重，他对卢学士也十分钦敬。李兆洛受了卢学士的教育与薰陶，在以后的治学、行事和处世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兆洛的科场功名

李兆洛在少年读书时期，经过许多名师传授，打下了深厚的学业基础。从十六岁那年初赴县试、中途折回之后，在家博读群书，研究经世的学问，并不急于求取功名。直到二十二岁时，始去邻县武进参加县试。这次县试是得的第三名，补武进县学生。接着参加常州府试和江阴院试，都得的第一，补廪生员。

李兆洛三十岁，伴随父亲征兰和哥哥廉龄，一同赴南京参加乡试，三人都没有考中。此后，兆洛又连考过两次，也都落选未中。他曾经写了首诗给他的朋友祝子常：“贾傅始弱冠，终军亦妙年。吾今已过之，偃蹇行自怜。非怨遇合迟，吾学实未全。道高身自尊，进退非徒然。”三十四岁时，又作了一幅“石船图”，以暗寓自己的意志。友人包世臣给它题词说：“直当撑此渡海，吾子必待乘桴。吾子是以不果行也。”兆洛虽然连次乡试都落选，而名望却越来越重。友人中有劝他入籍别处去参加乡试，但兆洛坚不同意，不欲走侥幸的道路以求取功名。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李兆洛又赴江宁参加乡试，竟荣获第一名，时年正三十六岁。这次乡试的文章，都写得义蕴深博。监试官阳城张敦仁，看到了李兆洛的四书题试卷，十分赞赏；但又顾虑不能投合当时的俗尚，深怕众试官看不中意，便亲自抄录全卷，从容提给主考官戴均元说：“象这样的文章，该怎么样安置？”戴均元看完了说：“试场中果真有这样

的文章，难道可以把它安置在第二名么？”张敦仁就从袖中取出李兆洛的朱批试卷说道：“这一本试卷，不就是从这次试场中来的么？”主考官随即命人把李兆洛的五经文试卷和策论试卷一一取来，给各监试官传观；各官看过后，都啧啧称赞。就这样，李兆洛便高中的这届乡试第一名，被称为“江南名解元”。试院中有个房师，名叫周垣，他看到李兆洛试卷中有个“算”字，不识，问张敦仁。张敦仁说：“这是古写算字。写这篇文章的人，一定通晓算法。”到评议试卷的时候，周垣也竭力赞成定李兆洛为举首。

李兆洛三十七岁，赴北京参加礼部会试。那次主持会试的总裁共四个人：尚书戴衢亨、内阁朱珪、侍郎蒙古恩公普、满洲英公和。等到试卷评完发榜，一查李兆洛名字，排在第一百六十七名。戴衢亨惊愕地说：“这是江南名解元啊！怎能安置在这个名次？天下士子将会怎样讥评我们哩！”其他几个总裁，也都为李兆洛惋惜不止。后来殿试完毕，李兆洛的试卷，却选列在前十本的第一号进呈嘉庆皇帝过目点榜。这时候，主持会试的几个总裁，都认为这一科新状元一定是李兆洛了。谁知进呈时明明安置在第一号的试本，却被暗中调到第五号了。结果，李兆洛只是授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

李兆洛殿试没有能够高占状头，大魁天下，其中会不会另有别情呢？这个疑问，后来也有好几种传说：“李兆洛不愿拜见穆彰阿，不愿给穆彰阿送礼，‘状元’便给了别人了。”

“李兆洛写得一手好字，满洲某大官要他写点东西，他偏不肯写。结果，即将到手的状元，被暗中换掉了。”总之，李兆洛所以不能中状元的传说会流传下来，将近百八十年而没有被人遗忘，这与当年阿谀、贪财、诬害忠良、贻误军国大事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决不是全无关系的。

李兆洛在凤台县的政绩

李兆洛四十岁在翰林院散馆时，实授安徽省凤台县知县。他在那里做了七年县官，其中还兼理过寿州州事。李兆洛初到凤台，就在自己住屋内贴上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栽花携得蓬莱种。”下联写的是“买犊教成渤海耕”。从这副对联来看，就可以想见李兆洛要把凤台治理好的抱负了。

凤台县紧靠淮河，离汝水、颍水也都很近，地势低洼，经常发生水灾，农民生活很是困苦。李兆洛到任后，把整修水利、改善农民生活作为第一件要事。他亲自下乡，进行实地调查。对村落的疏密，人口的多寡，山川的高低，土地的肥瘠，河渠的通塞，堰闸的修废，交通的便否，一一仔细勘察，作了记载。然后拟订规划，依次兴修。不到两年时间，便先后建了小沟口闸，修了丰湖、焦湖沟、鲁村湾和二里坝等四个闸，开了催粮沟和中心沟，筑了燕湖沟、大口沟、紫家洼、杜家洼、鲁家口、魏家洼、杨家脑、东玉叶巷和西玉叶巷等九处大坝，修了北门桥和十议桥。还置了北门义渡。这些水利工程逐步完成后，大片地区的水灾也随着逐年减少，农产屡获丰收，农民生活也逐渐得到了改善。

凤台西北的焦冈湖，外通淮河，湖周有高冈环绕。一天，李兆洛来到这里察看，看到湖边麦苗，长势很盛，知道这里土地肥沃，大可耕种。便发动当地农民，修筑水坝，疏通河道，防止淮水春涨，淹没麦田。他又想到：“如果在这里修堤筑坝，建造水闸，那末每年秋末冬初，淮水一落，就可以把湖水放到淮河里去，湖内低地，都可种上麦子，成为麦田。春夏间淮水上涨，又可以导淮入湖，灌溉禾稻，不就年年可以栽稻种麦，取得稻麦双收么？”察看完毕，回县立即下令，教焦冈湖

周围农民，把整个湖规划起来，开河筑堤，修建水闸。恰好这年夏季天旱，李兆洛路过焦冈湖，坐轿穿过湖心，觉得水深不到一尺，心中非常高兴。就发动沿湖农民，准备好在焦冈湖内普遍种稻。后来秋收时，竟获得大丰收。这时候，李兆洛又劝农民拿出三分之一稻谷来，作为造闸开沟之用。他自己也捐了些俸钱支持他们。从此一大片低洼的焦冈湖，成为肥沃可耕、稻麦双丰收的良田。

凤台和寿州交界的地方，有一个西湖，湖的西北部属寿州管辖，北部属凤台县管辖，地势较低，满湖生长着芦草。明代时候，政府曾经在这里招民垦种过。到了清代，就把这里作为兵民樵牧的场所。规定兵四民六，两不侵扰。但是年代一久，规定的界址，已经不大明确。当地驻军，常常纵放马匹，随意践扰民田。农民长期受害，无处告诉。听得凤台知县李兆洛刚直清正，有“包青天再世”之称；一天，寿州农民们手擎状子，上凤台县告状。李兆洛因这事不属本县范围，劝他们回寿州去稟告。农民跪在堂前，苦苦哀求，不肯起来。李兆洛无法，只得把状子接来细看，又问明了有关情况，然后劝他们回去，在家等候消息。经过几天的调查察访，把前后情况，一一弄清；于是毅然下令，把满田正在放牧的兵丁，连同马匹，全部驱逐出去，并不准他们再来这里放牧。那些放牧的兵丁，不禁喧噪起来。寿州总兵把这事上告安徽抚院，李兆洛据理力争。抚院只得下令凤阳知府、寿州总兵和寿州知州，会同凤台知县李兆洛，去到西湖实地勘丈。丈量下来，兵得十四里，民得十七里，划定界址，双方都不准越界侵扰。一百多年来，受害受扰、无处可告的西湖农民，嗣后在这里的谷物种植，总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凤台是寿州的分县，地瘠民贫，风俗不淳；又常犯水灾，

人民生活困苦，一向被称做难治的县分。以前在这里做知县官的，老是一年半载，就要设法调任，或竟辞官不做，所以连官署的房屋，都破旧得不堪居住。尤其是西境与阜阳接界，北境与蒙城毗连，离城都有一百多里。即使有几个在这里做过三年两年的知县官的，也从来不会到那些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因此匪徒众多，道路难行。李兆洛在任时，经常率领从人，骑马到四乡去观察民情，访问疾苦。往往出其不意，捕得一、二匪首，回县后善言规劝，让他悔悟过来，改过自新，重做良民。又窥察匪首中有一些讲义气、重友谊、性情比较豪爽的，就真诚留用他们，充当衙役，教他们广做劝抚工作。不几年，盗匪敛迹，境内大治，真的实现了“买犊教耕”的愿望。

李兆洛在暨阳书院

李兆洛任凤台知县到第七年上，因父亲逝世，卸任回家居丧。三年服满之后，不愿再入仕途，乐意授徒讲学，奖掖后进。他曾先后主讲过安徽的真儒书院和敬敷书院。南京的正谊、钟山两书院，也几次邀请他去任主讲，他因事不能分身，都婉辞谢绝了。后来在五十五岁那年，始受江阴人士之聘，主讲暨阳书院。江阴与阳湖，壤地相接，而暨阳与三河口故里，距离尤近，相隔只三十里，就和自己家乡一样。此地、此事，对李兆洛本人来讲，是最为适合的了。他决心长期留在这里，继续整治学业，培育后人，以度晚年。

李兆洛初到暨阳，首先走访有藏书的世家，求取先贤遗著，阅读摘抄。或者记下要目，以供参考。看到了他们的书翰墨迹，往往抚玩摩挲，不肯释手。有的还制成碑刻，传之久远，让人们临摹观赏。对那些先贤和旧友的后人，也非常关怀。或培养他们读书成材，或资助他们谋生度活。这些都是李兆洛景

仰前贤、珍惜友谊和乐育英才的具体表现。

李兆洛学术宏邃，博古通今，早已远近闻名。如今一旦回到江阴，各地好学之士，都纷纷来暨阳就读。请业问字的人，几乎每天不断。李兆洛就他们的根底志趋，因才施教，乐而忘倦。他教授学生，十分负责。初到暨阳时，首先给自己规定，每年正月中旬赴院开学，十二月中旬放假离院。平时，则要在省墓及春冬祭祀等日子才回家一走。学生在院读书，散居各室，每日辰、午、申三时，兆洛亲往各室督察。晚饭后，往往把学生会集在学轩庭中，漫谈、讨论学业上各种问题，到深夜才散。批改院生课卷，先要通篇看了一遍，加上圈点，然后再加评语，最后才评定甲乙等第，从不马虎。夏天晚上，常和院生一起乘凉，有时带头背诵整篇整段经书，大家也随和着你背一章，他背一段，欢畅愉快，习以为常。他与院生之间的关系，胜于家庭父子。终年同桌吃饭，不备私菜。教学上循循善诱，热忱指授，从不面加斥责。生活上自律谨严，处处以身作则，使学生们潜移默化。院生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奉为严师益友，情深异常。李兆洛主讲暨阳书院，前后达二十年，深得江阴人士的爱戴。暨阳学生科第之盛，一时罕与伦比。治经术、善古文、通音韵、习训诂、订舆图、考天文律历及成名成学之士，一辈辈不断成长起来。而李兆洛的声望，也就愈到晚年愈大了。

李兆洛的学术成就

李兆洛自幼好学，无书不读，无学不钻。早在壮年时代，即已成为博学多能的学者。他最喜欢研究史学，但是他阅读“三通”、“二十四史”等书，与阅读经学、文学诸书，并不割裂开来，而是互相联系贯通，参考发明。对史实的出入，字

句的舛错，一一详加校正。特别对于疆域的沿革，地名的异同，都要点滴割录，仔细查考，多方核对。务使每一条都得出个正确结论，为以后编著成书，作好准备。他做这些学问，刻实认真，数十年如一日，从不疏懈间断。他为学力求实用，不欲以文人自居。所作诗文，不肯留稿，不编刊诗文集；他认为这是沽名钓誉之事，无裨实用，所以不肯这样做。现行的《养一斋文集》二十卷和《养一斋诗集》四卷，还是李兆洛死后，他的学生们从各处搜集到的一些遗作编刊而成的。

李兆洛学术深邃，知识渊博，科技制作精巧。他的巨大成就，可以从下列各项事业中得其梗概：

(一)校读书籍 李兆洛的读书方法，与众不同，熟读强记，是其余事。主要是一面熟读理解，一面还认真校订。如对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宋乐史的《太平环宇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书，都特地选购好的版本，用朱笔写着精美的蝇头小楷，加以校录。对于其他经史诸书，也都“手加丹铅，校讎脱，正错悟”，一丝都不肯苟且、马虎。

(二)校刊名著 旧时学术名著，由于转相传抄刊行，谬误已多。李兆洛学识渊博，知错必纠，不经过亲自校正，不肯随便刊行。当世名流学者，也都争聘李兆洛为他们担任校刊，重新出版名著。所以李兆洛一生校刊的书籍极多。著名的有《道乡先生集》、《张皋文著作》、《古文辞类纂》、《全唐文》、《皇朝文典》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古籍和先贤文集，不下一二十种。

(三)编刊《骈体文钞》搜编自汉魏至隋八代全文 当世谈论文章，一般都盛推桐城古文，而轻视骈体文。古文、即所谓散文。散文、骈文，由于形式不同，几乎形成对立，互有讥评。李兆洛从历史观点出发，深刻研究了历代文章的演变过

程，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唐宋散文，来源于秦汉。从秦到隋，文章的体裁虽然不断起着变化，而文章并未有别的名称。直到唐以后才把秦汉文称做古文。后世学古文的，只知道文宗唐宋，而不知道宗两汉；其实两汉文就是骈体文之祖，要宗两汉，就一定要从骈体文入手。排除骈体文，就等于把文的历史割去了一段，上下就不衔接了。李兆洛根据这个认识和主张，下了很多功夫，选编成《骈体文钞》三十一卷，刊行于世。使后世学者，得以沿流溯源，不致偏重偏废。骈散同源这个论点，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四)编著李氏五种 李氏五种，是李兆洛毕生钻研经史，潜心舆地，积累了丰富资料，编著而成，为后人研究史地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五种的名称是：《历代地理韵编》二十卷，《皇期舆地韵编》二卷，《历代地理沿革图》一卷、二十二幅，《皇朝一统舆地图》一卷、二十一幅，《历代纪元编》三卷。

(五)编纂方志 李兆洛在阅读史、地诸书的同时，曾经备购各省通志，作过研究，所以对于方志的学识是很丰富的。他首次编纂方志是在凤台知县任上。那时他运用自己的学识、见解，结合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制定县志体例、纲目，并自任总纂，广收全县现实资料、史料等精心编修，成为具有实际作用的《凤台县志》十二卷，博得当世的一致好评。李兆洛在这方面的事业做得很多，曾先后参与过《怀远县志》、《东流县志》、《泗洲志》、《江阴县志》、《靖江县志》、《武阳合志》等编纂或指导工作。他在方志学方面的声望是很高的。李兆洛在暨阳书院时，还搜集编辑了好几套《旧言集》，内容都是地方掌故、名胜古迹、故事传说等富有历史意义的资料，为后来修辑县志作好张本。

(六)重视祠制、谱学 李兆洛对于当世盛行的祠堂建制和宗谱修编，极为重视，实际上也是把经学、史学融合到祠堂、族谱中去的一种具体事业。他对家乡地方诸姓氏的修谱事务，颇为关心。凡是请到他做监局或写谱序，他总是对照礼制、查阅史实，纠正错误，郑重编写，务使后人有所教益。北墅许氏修谱，李兆洛写的盖谱序，就把许氏源流，详细考核；旧有谬误，尽予纠正，就象校刊古籍一样重视。这是他以经学、史学施之于谱学的实例。他自己族中曾建造一个祠堂，称做家庙。关于安排神主及祭祀等细节，都根据礼制规定，一一详诫子孙，世世遵从。这也是重视祠制的实例。

(七)科技的钻研与制作 李兆洛在科技方面的钻研、发明和制作，是他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也是他闻名中外的另一重要因素。他取得这些成就，是他长期钻研天文、舆地、数学、历法等的结果。是经过反复规划、计算、制作、试验而成，不是轻易得来的。主要的制品，有铜刻漏、天球铜仪、日月行度铜仪和地球仪等，制作精巧，刻度准确，运转灵便，颇合科学原理，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在一百五、六十年前的封建皇朝，一个由进士出身的学者，竟能设计制造这样的先进科学仪器，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他对科学技术的刻苦钻研和发明创造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景仰和学习的。

李兆洛的方志学

陆振瀛

方志是我国极为珍贵的一份文化遗产。对它作切实的科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容忽视的一项任务。

作为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方志学，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和历史学一样，特别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总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所以，历来的统治者都很重视方志，并且自觉地倡导修纂方志。士大夫中一些有识之士，不仅在他们当政期间主张或参予修纂方志，而且在所谓“致仕”、“归田”之后，常常主动倡修或者应邀纂辑乡里和别地的志书。姑不作过远的历史追溯，就以清代而论，康熙和雍正都几次下诏，指令各级官吏纂修省、府、县志。而巡抚以下地方官的修志之风，蔚为时尚。因而在乾嘉以下，逐渐地出现了我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高潮，方志撰著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以及方志理论的进展，都是前所未有的。不少“名贤”、“硕儒”，如毕沅、戴震、钱大昕、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等人，都是有影响、有成就的名家，李兆洛也是其中之一。

李兆洛是清代颇有声望的学者，于经、史、文学、天文等诸领域都有独到的成就，向为学术界所称誉。包世臣称他：“尤嗜舆地学，备购各省通志，较互千余年来水地之书，征之正史，刊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与原文不符者，惟开化戴简恪公，友生中惟吴沈钦韩文起，差足相上下，余无能为拟似矣”（包世臣《李凤台传》）。《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

术诸家姓名略》“史学家”条也以为他是地理名家。而与地理有关连的方志（清代大多数学者把方志归属于地理之学），在他的著述中，有着相当的比重。

传世的署名李兆洛修纂的地方志有《凤台县志》十二卷，《怀远县志》二十八卷，《东流县志》三十卷，《武进阳湖合志》二十六卷首一卷。其实，只有《凤台县志》是他在凤台知县任内主持其事并纂辑成书的。《怀远县志》是应怀远知县孙让之请，只完成一半多，由董士锡续成，最后又由他订正。《东流县志》只是为人之釐定章程，提挈纲要，不出于他的手笔。《武进阳湖合志》始修于道光十九年，这时申耆的年事已高，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他就去世，所以，名义上是由他司纂辑，实际上系出于别人之手。说明这一点很必要，因为后世对《武阳合志》屡有非议，显然是不能由申耆承担这个责任的。

应当提到，早在乾隆五十七年，申耆还只是二十四岁的青年，卢文弨议辑《常州府志》，他曾积极参与，“多所采访，送入志馆。”可惜因卢文弨离任去常，没有竣事。当他在凤台兼理寿州时，准备修纂《寿州志》，已经着手采访，后因离职而停止。但还可以从《凤台县志·列女》看到附有关于寿州的记载。道光十九年，常州知府黄冕权续修府志，请申耆总其事。他刊定体例门类，审阅过府属《靖江县志》，又为《江阴县志》作《序》。后因经费、人事等原由，半途而废。

由此可见，申耆一生对方志所付出的精力是不小的。他所纂的《凤台县志》，一经刊出，就受到各方面的称颂，誉为善志。孙尔准慕其名曾先后聘他去修《安徽通志》和《福建通志》，因故未就。也足见他于方志学享有声誉。

下面对李兆洛的方志学，提出一些粗略的肤浅的看法，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李兆洛治学，清人魏源有这样的评说：“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甚。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训诂声音，瓜剖瓠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生于其乡，独治《通鉴》、《通典》、《通考》之学。疏通知远，不囿小近，不趋声气。年甫三十，而学大成。兼有同辈所长，而先生自视谦然如弗及。”（《古微堂外集》卷四）这恰是说到了要害之点的。他继承了经世之学的传统，崇尚务实。如曾用红、黑色二个图以识别舆地的沿革；又铸造天球铜仪和日月行度铜仪各一个，拿来教育学生，倡导实学。这种学风，也反映于他的修纂方志和别的论著中。

申耆主张的“致用”、“务实”，首先表现在修志的目的上。他任凤台知县，政务繁冗，之所以挤出时间来纂修县志，不只是因为“旧志陋而不该”；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势，人民谣俗，苟有不晰，则不可以为治。况南北之交，风会所趋哉！”（《凤台县志序》）他在《怀远县志序》中也说：“志者，所以志也，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凤台县志·古迹》说得更具体：“山川、都邑、室屋、祠墓，名贤轨迹之所寄，书史图籍之所在。可以见时会之盛衰，地势之险易，陵谷之迁变，政治之得失，风俗之淳薄。以之斟酌条教，风示劝惩，览一隅知天下，其所裨甚钜。故于舆地志外，别出古迹，非徒网罗放失，凭吊俯仰，为风雅之助